

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

TI ZHI BIAN GE ZHONG DE JING JI
WEN DING ZENG ZHANG

刘国光·主编



中国计划出版社

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

刘国光 主编



中财 B0032134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书号 352878

册号 10012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0 北 京

责任编辑：曾 辉 孙晓岩

封面设计：朱 毅

版式设计：孙国安

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

刘国光 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月坛北小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1/32 13.125印张 316千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80058-104-7/F·64

定 价：6.00元

主 编: 刘国光

副主编: 田江海 张曙光 杨仲伟

各章执笔人

第一章: 田江海、李拉亚; 第二、三章: 陈东琪、郭晋刚; 第四章: 张曙光、杨仲伟; 第五章: 王振中、于立新; 第六章: 袁钢明、王 诚; 第七章: 孙学文; 第八章: 仲济垠; 第九章: 张燕生; 第十章: 戴园晨、沈立人; 附录: 孙世铮。

CD38/27

序 言

如何实现和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近40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反复探索而又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改革以来，又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加强理论探讨和政策研究，不断提高经济决策能力和政策操作水平，使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建立在科学有效的基础之上和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什么是经济稳定增长？很明显，它是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是经济短期均衡和长期发展的恰当结合。从表象上来看，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它并不否定某些经济周期的存在和发生，但要努力使周期性波动不要过于频繁，波动幅度也不宜起伏过大。它以长期的持续的迅速的经济发展为表征，内含着经济质态的提高和结构的变迁。它是以经济创新和经济效率为基础，以人民的利益和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的经济的良性循环和有序发展。经济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增长是经济稳定的保证，在稳定中求增长，以增长促稳定，就能求得宏观经济的长期有效运行。单纯的经济稳定和单纯的经济增长都是有害的和不足取的。

1978年以前的30年，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可谓大起大落，几经折腾。既有五、六十年代“大跃进”和大搞三线建设的过热状态，也有“十年动乱”中的经济危机时期，虽然从产值增长的名义速度来看并不算低，甚至属于高速增长的国家之列，但实际的经济效率并不理想，人民并未

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却不得不承受经济剧烈震荡的后果。

1978年以来的10年中，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开始进入了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仍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虽然经济波动的幅度较之过去要小，然而波动出现的次数却要比过去频繁，扩张和收缩不断交替，经济运行往往处于过热状态，而经济效率却一直低下，人民生活虽曾有明显改善，但社会积累职能却大大削弱，近几年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经济的长期发展面临着很多问题。我国的经济运行在高速低效基础之上的繁荣局面，掩盖着实际上存在的不稳定和可能发生停滞的危险。

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之所以未能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既有经济体制上的原因，也有发展战略和政策上的原因。在经济改革以前，传统经济体制既是一个超稳态的体制，又是一个不稳定的体制。超稳态遏制了经济的活力，降低了经济效率，削弱了稳定增长的基础，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难以超越平面扩张的轨道而进入质态跃迁的过程；不稳定是指人为的影响和干预太大，战略选择和政策操作上的失误很多，造成了经济上的不断波动。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体制的超稳态结构，释放出了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活力，但是，新旧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造成信号混乱和导向错误，另一方面也造成主体行为扭曲和约束失效，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而且每一次制度性变化也往往是不稳定的。这就使得已经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不仅难以导向提高经济效率的正确方向，反而加剧了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导致了分配斗争的表面化，阻抑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决策不够清醒，政策操作失当，就会使经济运行发生共振现象，形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局面。因为，在体制变

革中，我们面临着双重困难：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既要有稳定机制，又要有稳定政策，而目前的实际却是二者都很不健全。我们进行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经济稳定增长机制，如果在稳定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在政策操作上又实行一系列不稳定的政策，那么，经济稳定增长就很难实现。这是几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结论。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在理论上找到它的反映。近10年来，我们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探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出现了争论纷纭的众多理论观点，形成了比较活跃的局面。经济稳定增长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但是，也有一些理论和主张与稳定增长的思想相悖。例如，有人提出了“紧运行”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紧运行，其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与有限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稳定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而否定了稳定增长的必要性。有人提出了“通货膨胀无害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强迫储蓄和扩大投资的手段，是摆脱低收入状态和改善贸易条件的杠杆，因而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企图以牺牲稳定为代价来求得经济增长。有人甚至提出需求不足论，面对我国社会总需求膨胀的明显事实，极力论证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态势不是需求膨胀，而是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采取刺激需求的宏观政策。与此相对应，也有人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但却忽视供给增加的资源瓶颈和社会成本问题，主张单纯增加供给。至于我国经济运行偏离稳定增长轨道的根源，有的强调体制原因，有的强调政策原因，也都不免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

与此同时，这个领域还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有些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制度因素决定总量态势和总量关系，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但是，制度因素是如何决定总量关系的，至今尚未见到认真的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再如，在体制变革中，要实现稳定增长，需要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但是，如何结合，如何做到改革协调和政策配套，要不要坚持紧一点的宏观政策和松一点的制度变革，也缺乏深入研究。还有，如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会不会出现滞胀，它与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有什么不同，等等，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要科学地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

正是基于上述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发展的背景，我们组织编写了《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一书，力求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本书的中心不是探讨了一般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问题，而是主要探讨了我国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问题，分析了我国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结构失衡、通货膨胀、内外摩擦的形成机理，揭示了经济不稳定和低效增长的体制原因和政策原因，提出了改革协调和政策配套相互结合等一系列政策主张。由于本书各章分别由不同的同志完成，所以各章的具体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个别观点甚至大相径庭，但全书主题思想是一致的。虽然全书逻辑结构不很严密，这并不损害本书的内容和质量，倒是体现了百家争鸣的方针。

刘 国 光

1989.6

目 录

第一章	总需求形成与双膨胀过程·····	(1)
第二章	有效供给不足与低效增长·····	(36)
第三章	结构变化与增长周期波动·····	(64)
第四章	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	(101)
第五章	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稳定增长 ·····	(142)
第六章	金融改革与货币政策 ·····	(178)
第七章	财税改革与财政政策 ·····	(214)
第八章	收入分配与社会福利保障 ·····	(252)
第九章	改革开放与贸易、国际收支政策 ·····	(286)
第十章	改革协调与政策配套 ·····	(325)
附 录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简介 ·····	(368)

第一章 总需求形成与双膨胀过程

我国宏观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始终是左右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传统体制下总需求膨胀更多地表现为投资需求过旺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在双重体制下则是需求的双膨胀。因此，本章我们将对双重体制下的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的成因、特点及其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加以全面的分析，以说明需求管理与经济稳定增长的紧密联系。

第一节 双重体制下的需求形成过程

一、传统体制下的需求形成

传统体制指计划产品型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下，从中央政府直到地方各级政府形成了一支又粗又长的看得见的手，直接调节控制经济系统的运行。虽然今天控制经济运行的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分析传统体制下的需求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对于研究双重体制下需求形成过程，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般而言，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一是消费需求。这两个方面各自形成的渠道是不相同的。在传统体制下，投资需求完全取决于中央计划，企业本身不具备多少积累能力，企业利润几乎全部上交，企业所需的扩大再生产资金由国家计划拨给，并且企业的折旧基金也绝大部分上交财政，其中大部分又形

成了计划内的投资资金，成为扩大再生产资金的一个来源。在传统体制下，虽然也实行过分权，并且当时的决策人也意识到了绝对集中计划并不利于经济发展，逐步放宽了对预算外收入的控制，扩大了地方投资决策的权力。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长期形成的格局。中央财政仍是投资资金来源和使用的主要闸门，企业一直处于没有投资决策权的状态。

在传统体制下，一方面，企业不能自行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企业又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即所谓投资冲动。每年制定计划之时，便是企业向上级政府部门争投资之日。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都力求中央多给自己拨款。因此在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难免为解决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而讨价还价。这种拉锯战所形成的投资资金分配的结果，难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从消费需求的形成过程来看，如果说，中国传统体制下投资需求的形成机制与苏联东欧国家极为类似，那么，消费需求却有一定的差别。在计划产品型经济体制下，由于财政约束的软化，企业具有提高职工工资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内在动力，同时又不会有破产的威胁。因此，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将出现膨胀。但由于中央政府为了保证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又极力要压缩消费基金的增长，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结构上的失调。可见，在传统体制下，企业内在的扩张消费的动力受到严重限制。在中国，这种限制远较苏联和东欧国家为重。工资水平长期冻结，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消费基金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严重不协调，这是中国传统体制下需求形成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并不起源于微观的企业内在机制，而发端于宏观的中央计划决策，是政治施加于经济的结果。这可由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的统计资料验证，见表1·1。

表1·1 居民消费水平和国民收入平均每期增长速度对比 单位：%

时 期	全 国 居 民	农 民	非农业居民	国 民 收 入
“一五”时期	6.6	5.1	9.8	8.9
“二五”时期	-2.5	-3.3	-1.2	-3.1
1963—1965年	11.2	12.1	9.6	14.7
“三五”时期	4.9	5.5	3.9	8.3
“四五”时期	4.5	3.8	5.8	5.5
“五五”时期	6.2	5.2	7.9	6.1
“六五”时期	10.0	11.2	8.0	9.9
1953—1987年	5.5	5.1	6.2	6.8
1979—1987年	9.3	9.1	9.6	9.0

注：本表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第64、53页。

由表1·1可见，1953—1987年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落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改革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变。应该指出，在中国传统体制下，尽管工资水平长期冻结，但由于劳动力人数的绝对增加，导致消费基金的绝对增加，而且这种增长速度，仍快于消费品增长速度，因此，消费领域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仍然存在，排队和发各种购买券长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的长期冻结和消费品生产赶不上工资绝对额增长的局面，是中国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又一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构成了经济理论界长期难以解开的一个纽结。工资水平长期冻结，在物价固定不变下，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多大改善，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比，个人消费呈现萎缩状态的同时，消费品生产又赶不上消费资金绝对额的增长，市场上仍是需大于供，呈现需求过大之势。这是一个矛盾。如何认识、解释这一矛盾，仍然是我们当

前理论研究中争论激烈的一个热点，也将是我们在本章中将要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

二、双重体制下需求形成的微观因素分析

双重体制比传统体制有较大变化，这可表现为如下两点。首先，双重体制下，投资权力由集中型转化为分散型，企业和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预算外资金已接近中央政府手中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其次，双重体制下，消费基金由缓慢增长转向较快增长，无论是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是消费基金总量的增长，以及消费增长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建国以来最快的时期。1979—1987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9.3%)已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9.0%)。

双重体制的这两大特点，无疑将对需求形成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之具有种种新的特色。而需求形成过程，既与微观经济因素，特别是企业体制因素有关，又与宏观经济因素，特别是宏观调控体制因素相关。因此，从这两个不同层次上对双重体制下的需求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下面我们先从微观经济层次分析开始。

在双重经济体制下，随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企业自主权的确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利益主体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刺激力的不断强化，是微观层次推动需求膨胀的最大催化剂。目前国营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有一定程度的分离，每个企业都有各自的利益。这样，就有一种极强的利益机制在支配企业的行为。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追求收入最大化(请注意，这里我们用收入最大化代替通常所说的利润最大化。收入最大化是指职工的收入最大化，这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是有区别的)。

为了实现收入最大化，国营企业可以靠内部积累，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当前利益。但企业行为短期化和局部利益原则使他们放弃了这种选择。另一选择是向上级伸手或向银行借款。由于企业归国家所有，国家也就依然施惠于企业。因此，企业一方面通过少留积累资金，最大限度地增加职工当前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向国家和银行多拿资金，最大限度地增加企业投资。从而埋伏下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的根子。当长期形成的低利率、低汇率（外币定值过低）、低物价、低工资的政策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性调整以前，其他经济主体如集体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都会利用改革出现的漏洞扩大各自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加剧了需求膨胀的态势。

在双重体制下，国营企业两权分离问题未能得到切实解决，影响企业真正的自负盈亏，助长企业行为短期化，是引发需求膨胀的重要根源。现行的全民所有制，在企业内部实际上往往缺乏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从而在利润分配方面，偏向于多消费。因为消费是属于自己的利益，而投资虽有长远利益，但近期看，不利于消费，且投资转化为固定资产后，便成为国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在保持高消费的前提下极力向上级争投资、争资金，靠国家的父爱来争取长远利益。国营企业的承包，虽刺激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也助长了企业行为短期化这一倾向。企业承包期限一般定为3—5年，因此，追逐短期利益便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可见，我们通常使用的“双紧政策”虽然能收到一定的治疗需求膨胀的效果，但总是治标而未治本，过一段时间，被抑制的需求迅速抬头，造成下一轮更猛的膨胀。根源就在于微观层次上两权分离问题未能得到切实解决。而初次分配的不合理结构，虽可经再分配而短期掩盖这种病根，但终究要在市场上表现出来。尽管

体制改革中逐渐实现了两权分离，但由于两权分离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也就无法根治财务约束软化的传统问题。两权分离只有与明确产权，自负盈亏相结合，才能使新经济体制从旧体制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体制。随之，需求膨胀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抑制。

在双重体制下，现行的分配制度、价格制度不合理，也是加剧需求膨胀的重要原因。当前，是一部分单位和个人收入过高，与一般群众差距太大，对此社会上普遍地存在强烈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某些钻空子、利用双轨价格转手买卖、哄抬物价的“倒爷”，更是深恶痛绝。这些“倒爷”既没有创造财富，也没有为创造财富起积极作用，相反，他们的行动是把本应属于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从而把本应属于生产投资的资金，转化为消费资金。这无疑是对本已存在的需求膨胀火上浇油。

在双重经济体制的微观层次上看，还难以全部说清需求膨胀的形成，只能说明，宏观经济层次上表现出来的需求膨胀，已在微观层次上埋下了根子。微观层次上的体制因素，对宏观层次上的需求膨胀问题，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因此，在微观层次上，既不能解决需求膨胀的测定问题，也不能解决需求膨胀的最终形成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只能在宏观经济层次上解决。

三、双重体制下需求形成的宏观因素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解决怎样测定需求膨胀。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确定的前提下研究需求膨胀的形成过程问题。

总需求怎样定义在经济界还未形成一致意见。我们认为，用总消费（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加总投资（积累加折旧加大修理）代表总需求是较为适当的。一方面，这样定义的总消费和总投资是可测的，统计机构能提供这些数据；另一方面，总消费和总投资

已把社会上的各种最终需求都概括在内。要注意的是，总消费和总投资之和应等于社会最终产值。因为从实物形态上看，社会最终产值的物质形态是完整的。这样定义的总需求，实质是最终需求。

确定了总需求的口径后，那么怎样测量需求是否膨胀呢？这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①国民收入使用额超过国民收入生产额，说明需求超过供给；②消费基金增长速度大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说明消费基金膨胀；③劳动者工资和其它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说明消费基金增长过速；④货币购买力大于商品可供量，表明需求膨胀。这些判断需求膨胀的标准是否有道理呢？从统计上看，国民收入的使用额和生产额本质上是应该相等的。因此，不能根据统计的这方面数据来判断需求是否膨胀。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只能说明新增价值安排上，消费比重大了，用于生产的比重小了，但并不一定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它所揭示的问题是，人们获得了近期利益而牺牲了长远利益。这实质上是发展速度的选择问题，而不是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平衡问题。需求增长速度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或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之比也是如此。相对而言，市场上货币流通量与库存商品价值量之比较能说明问题，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这方面的传统经验已不能解释问题，市场上货币量与库存商品价值之比究竟多大适宜，是很难判断的。因此，这只能大致说明问题，而难于作为测量需求膨胀的尺度。

我们认为，在双重经济体制下，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而某些重要商品如钢、煤、木材等虽然仍有计划价格，但也存在议价，且议价占的比重有迅速增加之势。这种价格双轨，也与市场供需情况相联系。供大于需，虽然计划价格不动，但其议价会

下降，反之，需大于供，计划价格不动，议价将提高。因此，从总体考察，虽然市场价格还没有成为主导市场商品供需的决定力量，但价格的波动，已能反映供需的缺口态势。如果需求大于供给，那么就意味着需求膨胀，或者，我们可由此定义需求大于供给为需求膨胀。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供需的缺口定义为需求膨胀的尺度。而供需的缺口又可以由价格的波动间接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价格指数间接测量需求膨胀的程度。诚然，用价格来作为测量需求膨胀的尺子也有一定弹性，但与其它方法比较起来，它的弹性较小，较为客观、可靠。当然，如何缩小价格尺子的弹性，也是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可用市场上缺货的程度来近似地矫正价格尺子的弹性。比如某种产品，实行计划价格，而此时该种产品需大于供，于是一方面它的议价上涨，另一方面它在市场上可能脱销。如前一段时期市场上彩电、冰箱缺货，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样，市场上将凭票供应，而黑市上彩电票可卖几百元钱一张，这便间接体现了彩电的真实市场价格。此外，商业部门也可分析出市场上彩电缺货的程度（当然，其分析方法的准确性问题还是可继续研究的课题）。

可见，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价格和短缺将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价格提高，相应短缺将减少，价格不动，短缺就将增加。因此，只有同时测量价格和短缺两个变量的变动程度，才能说明需求的膨胀程度（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程度）。

如何把短缺化为一个可测量的量，是值得研究的。广义地说，短缺表示有钱买不到东西，它或以现金形式保存在消费者手中，或以储蓄形式表现为银行的存款。而后者又称之为强迫储蓄。凯恩斯在《通论》中曾讨论过强迫储蓄问题，但他的结论是如何测定强迫储蓄是困难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也尚未找到一种测量强迫储蓄的可行方法。这里我们把短缺数量乘以现行的最